

■访谈

接受内心的指引，心无旁骛走自己的路

——大解访谈录

□杪 杪



大解 原名解文阁，满族，出生于河北青龙县，现居石家庄。代表作有长诗《悲歌》、寓言集《大解寓言》、长篇小说《原乡史》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故乡是我出发的地方，也是我的归宿

杪 杪：您在秦皇岛青龙县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回首过去，您如何看待童年和故乡在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大解：1957年，我出生于燕山东部的一个山村，村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十里以外的地方。我的一个小伙伴曾经到过县城，并在县城礼堂看过一场电影，回村后跟我吹嘘说：“青龙县那家伙，大礼堂那家伙，真叫大那家伙。”他的经历让我羡慕不已。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个礼堂大概有一百多个座位，非常低矮。

现在回头看，我有些庆幸自己生在一个古老的山村。燕山东部属于泛红山文化区，受萨满教影响，万物有灵的信念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许多传说连接着神话。我五六岁的时候，村里有几十户人家，大多数都是茅草屋，现在想起来，就像是神的住地。那时人们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方式跟《诗经》时代没有太大区别。而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人们迅速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硅基生命已经出现，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很可能迅速变成“前人类”。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一个人跨越的历史足以接通古今。

作家是被生活塑造的。我的生活给了我无穷的财富，让我受用不尽。因而，在人们试图走向世界的时候，我选择了还乡，回归故土、回归肉身、回归神话，并重建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言说世界。我的许多诗，尤其是我的小说，都是基于还乡的理想，在人的身上恢复神性。故乡是我出发的地方，也是我的归宿。

杪 杪：您还记得第一次写诗的情景吗？您的处女作是哪首诗？它是怎样被创作和发表出来的？

大解：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旧体诗，因为我最早读到的诗集是《千家诗》。《千家诗》是繁体字，辨认繁体字需要查字典，于是12岁那年，我独自走40里路，专程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新华字典》。那次累惨了，如果我在途中翻山时被狼吃掉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后来，我的高中同学王进勤知道我写诗，就指导我写作，而他是受他同村同学詹福瑞的影响。1973年高中毕业后，以詹福瑞和王进勤为主的几个回乡青年共同创办了一本手工刻印的文学杂志《幼苗》，创刊号每人出资两角钱，作为刻印工本费。作为创刊人之一，我也出了钱。可惜《幼苗》出刊4期后，由于人员变动而停刊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我写了很多年诗，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小小说《李老四的苦恼》、《承德日报》，1982年），后来在青龙县文化馆的内刊《飞瀑》上发表过几次诗歌习作，都是非常幼稚的作品。虽然不值一提，但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时发表的时候，也是很兴奋的。

我的工作快乐，写作更快乐

杪 杪：每次看到您的创作简历，总会被“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这样一个信息吸引。您是什么

时候决定“弃水从诗”的？有什么机缘吗？

大解：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一直坚持写诗。那时，我比较喜欢北大校园，节假日经常去清华西南角的小门，进入北大东北角的小门，然后坐在无名湖边的大松树根上写诗。那时清华大学广播站经常朗诵诗歌，我的诗至少占一半以上。

大学毕业后我在水利部门做技术员，曾经独自做过一个小型水电站的建站和输电并网设计，后来由于资金不到位，致使全部设计停留在图纸上。有人说兴趣决定成败，我的兴趣不是当技术员，而是写作。后来我干脆调到文化部门工作，1988年我到河北省文联《诗神》月刊当编辑，后来我的工作一直与文学有关。我的爱好与工作是一致的，我的工作快乐，写作更快乐。

杪 杪：那段职业编辑生涯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大解：1988年8月至1999年底，我在《诗神》工作了十多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时光。那时，编辑部里大多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工作环境自由轻松，主编也不刻板，整个编辑部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编辑们都很有敬业，认真看稿，写回信，与诗人们交朋友。那时都是手写稿，对于投稿较多的诗人，即使抹去名字，我也能从字体上大概猜出作者是谁。有时从来稿中发现好诗，编辑们会相互交流传阅，比自己写的都高兴。偶有外地诗人来访，免不了喝一场大酒，诗人们聚会也是快乐的。国内许多重要诗人都在《诗神》上发表过作品，发现新人，编辑好诗，做编辑特别有成就感。

杪 杪：能谈谈长诗《悲歌》的灵感来源和创作过程吗？您对长诗创作有哪些心得？

大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想写一部叙事长诗，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存史和精神史，至于怎么写、写多长，我心里也没数。由于汉语诗歌没有显著的长诗传统，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文本，那就只能自建一个结构，自创一种叙述方式。说实话，写作之前我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文化含量、精神高度、结构框架、细部肌理等因素，无一不影响着长诗的价值和意义。为此，我构思了3年多，写作历时4年，过后又回顾性地写了10万字笔记，前后历时10年。《悲歌》（16000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我拿到样书时，看到版权页上标注为史诗，吓了一跳。在汉语诗歌语境中，人们总以仰望的视角看待史诗，觉得史诗带有天然伟大的属性。其实，史诗不过是一种文体，就像小说和报告文学一样，是一种叙事方式，无论长诗、长诗、短诗，写好了才是好诗。诗的好坏与体积无关。

由于写作时间太长，我曾经想过，写完《悲歌》后我一定要大哭一场，没想到真正写完的时候，我非常平静，连一声叹息都没有，我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诗里了。我只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至于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交给读者和时间。

小说占五成，寓言占两成，诗歌占三成

杪 杪：《个人史》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这部诗集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您如何看待它在您个人创作中的位置？

大解：我的主要作品有长诗《悲歌》、寓言集《大解寓言》、长篇小说《原乡史》，这三部作品是三个独立的板块，在我的整体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分量。我写诗50多年了，出版了很多诗集，《个人史》是其中的一本。得奖了我当然高兴，但没有得奖的作品未必就差。我是一个作家、诗人，只看文本，不看别的。如果让我划分自己作品的板块，我的小说占五成，寓言占两成，诗歌占三成。在诗歌这三成中，《悲歌》占两成，短诗占一成，《个人史》是短诗作品中的一部分。

杪 杪：看来小说在您的创作中所占分量很重，您为何从诗歌转向叙事文学的创作？特别是《大解寓

言》的出版，您选择以寓言表达对生活世界的洞察和想象，是出于何种考虑？

大解：我写诗几十年，从没想过写小说。我有一个故事，是我和我老婆都知道的故事，她一直催我写成电影。说实话，我根本不会写电影，拖了好多年也没写。她说，你若再不写，我写。我以为她是随口说的，没有想到她真动手了，有一天我发现书桌上有一沓稿纸，她已经写了3页。她的开头是细节，到了第3页就变成了梗概。我看呆了，立即制止她的行动，不能让她把一个题材给糟蹋了。于是我立即动笔，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长歌》，发表在《人民文学》2008年12期。从那以后，我发现我有很强的胡扯能力，于是尝试性地写了一些极短的寓言，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发不可收，几年里写了440篇寓言，也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大解寓言》。寓言写作使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我从非理性出发，绕过现实，发现了生活背面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层面。

写下大量寓言以后，我不再写了，想要摆脱寓言，隔了几年，又有些不死心，还想再写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睡上了故土上那些过往的影子人群，那些神话般的存在，那悠久深远的生存背景，那荒凉和神秘……于是，我尝试性地写了一些大的寓言，我发现这些大寓言像是小说，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我在试图摆脱寓言时竟然穿过了寓言，进入一个更加辽阔的时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世界。小说创作让我体验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和飞翔感。这时我发现，我此前的所有创作似乎都是为写小说而准备的。

反过来说，我的寓言和小说，对诗歌创作又构成了反哺，使我近几年的诗有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我自身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精神谱系，诗歌一寓言一小说一诗歌，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如今，我的诗与我的寓言和小说一样，也有了更强的辨识度。

文学没有边界，甚至是混杂的

杪 杪：陈超在《个人史》的评论中，说您“以个人化的细节吟述方式写出了尘世的迷茫和辽阔、民间烟火气的恒远、农业的醇厚和艰辛、母亲们的‘圣恩’、底层的悲欢离合和桃红柳绿乃至灵魂超越的可能性”，同时说您的“修辞基础是先锋性的”。您如何理解这一评价？

大解：陈超对《个人史》的评价让我欣慰，也让我惶恐。他所说的这些诗歌元素，在我诗中确实存在，但与我内心中期待的好诗似乎仍有很大距离，因此才有“最好的诗是下一首”之说。

自从我迷上小说以来，那种在诗歌中捕捉不住的东西，同样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刺激我用另一种叙述方式从事语言冒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诗和小说有着相同的气脉，尤其是我的小说，是一种“混沌态”，人们沉浸在人神不分的原乡，人类的幼年与当下现实混合在一起，让我常有人间一梦之感。陈超已经走了10年了，如果他能读到我现在的小诗，我想他一定会拍大腿。

杪 杪：关于诗歌，有一句常见的说法，说诗歌是呈现生命真相或生命本质的艺术。在您看来，诗歌、小说、散文在对接生命、反映生命方面，有何种差异？

大解：诗歌不是玄学，也不是哲学，但诗歌确实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总是试图为那些捉摸不定的东西赋形，把灵魂显现为文字。生命真相和生命本质，在神学和物理学那里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而诗歌所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追寻的过程。诗人要的可能是一道光、一丝温度、一点力量，或自己体内幻化出的心灵圣景。同样是接近真相，小说可能依赖于故事或推理，层层剥皮，最后露出核心；散文需要情感推进或直接讲道理；而诗歌可以无所凭依，仅凭语言的魅力，也能击中你的心灵。不同文体选择的路径不同，过程和结果也不同。如果把诗歌比喻为因

电，那么散文就是乌云，小说则是一直在酝酿而迟迟不肯落下的风暴。

那么有没有跨越文体边界，将小说、散文、诗歌混合的文体呢？我想是有的。我个人在写作时，想得最多的是内容，而不是文体，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什么算什么。在我眼里，文学没有边界，甚至是混杂的。1982年，我在水利部门工作时，一座建水库淹没区移民搬迁的请示报告是我写的，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淹没区移民，要尽量成建制地搬迁，以保持过去生活所结成的人群体系，不至于因迁徙他乡而人地两生。”这样的文字出现在政府公文中，有些出格，但也很准确。

有时我很难把自己的东西归类，比如我的寓言，也曾被刊物当作微小说、散文、散文诗、故事发表过。我的诗里有许多叙事成分，像是在讲故事，含有小说的元素；小说则常常没有故事情节，只有诗意，有人说是诗小说，也有人说是寓言，更有甚者，抽取我小说中的一个段落，分行排列后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一字不动地当作诗歌发表，我觉得这里应该放一个笑出眼泪的表情包。

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灭亡

杪 杪：AI对文学的影响是这两年被广泛讨论的话题，您是否了解人工智能写诗的情况？您认为AI会给诗歌写作带来冲击吗？

大解：AI对人类的作用不可估量，对文学的影响和冲击也是革命性的。在网络大数据的支持下，AI可以快速整合网络资源，代替人类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传统的手工写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机器是否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创作？答案已经不容置疑。现在，我还没有学会利用AI写诗，但我想，未来的某一天，刊物发表的诗歌中可能会出现AI作品。句法和词素是有限的，而组合的方式几乎接近无限。AI可以写诗，但要说完全代替诗人创作，甚至超过最好的诗人创作的作品，我觉得目前还做不到，不过未来很难说。

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AI写作的问题，而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硅基生命/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一旦智能机器人具有自主学习和制作功能，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就会变成“前人类”。硅基生命不像人类这样具有漫长的成长期和衰老期，也不需要吃喝、睡眠、治病，它没有细胞，不老不死，可以批量生产，是真正的冷血动物，一旦发生逻辑混乱和指令错误，人类将会面临极大风险。

杪 杪：您如何看待近年来网上关于诗歌的一些争论？诗人该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自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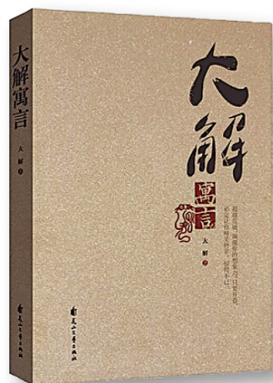
大解：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灭亡。伴随着诗歌的存在，争论也会一直继续下去。争论是诗歌现场活跃的表现，有争论就会有变化，尽管变化不一定是进步，但总比一成不变要好。假如唐诗一直延续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红楼梦》对当时堕落诗词的挖苦和讽刺达到了极致，书中人物作的诗，在一百里外都能闻到一股子脂粉气和酸腐气。新诗出现后，假如人们一直沿用一百年前的方式写作，想想看，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至于我个人的写作，很少受到外界影响。世界文学潮流多变，我只接受自己内心的指引，走自己的路，且心无旁骛、一意孤行。一个作家，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茧房，在里面安静地编织。当今社会看似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非常简单。在我眼里，人类科技飞速发展，但是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人们依然还在使用古老的肉身、血液、骨骼、声音、目光、眼泪，几乎与古人一样。抓住人类的本质，看人类就是简单的。文学创作同样也要抓住人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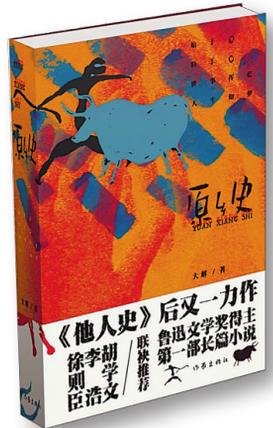
（杪杪系《诗选刊》杂志主编）



《悲歌》，大解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大解寓言》，大解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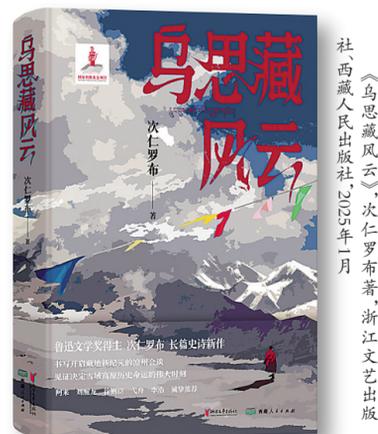
《原乡史》，大解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

■评论

让历史焕发出鲜活生命力

——评次仁罗布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

□徐 琴



《乌思藏风云》，次仁罗布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重要桥梁。它以其独特的“载道”之力，将过去与未来、个体与集体、文化与认同紧密相连。次仁罗布历时七载创作的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正是这样一部以文学之笔书写历史、以人性之光映照时代的壮丽史诗，它呈现了西藏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叙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起文化丰碑。

《乌思藏风云》以吐蕃王朝崩溃后的西藏为背景，描绘了一个诸侯割据、宗教纷争、百姓流离失所的动荡时代，以及在这个动荡时代中藏族人民的艰难抉择。小说开头通过吐蕃将军后裔娘卓·韦登这一角色的悲剧性命运，揭示了武力抗争的局限性与和平归顺的历史趋势。娘卓·韦登继承了先辈的勇猛与虔诚，试图以武力拓疆扩土，却在蒙古铁骑的碾压下惨败。他的牺牲不仅是对吐蕃武士精神的诠释，更是对武力征伐的深刻反思。次仁罗布以冷峻的笔触，将他倔强的身影映照在历史的帷幕上，同时也将历史的残酷和抉择的艰难交织在一起，揭示了和平与统一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品书写了萨迦派领袖贡噶坚赞的敏锐洞见和智慧通达。他审时度势，深知四分五裂的西藏无法抵御蒙古强大的军事碾压，不顾险阻，毅然选择前往凉州与端端谈判，最终促成西藏的和平归顺。凉州会谈，不仅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也为西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之后，结束了长期的地方割据，进一步确立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辖。次仁罗布通过这一时间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

在追求和平与统一过程中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文化交融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深层逻辑。西藏从分裂到归顺中央政府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西藏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里程碑。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次仁罗布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鲜活灵魂，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历史褶皱中的人性光芒。小说中的贡噶坚赞，作为萨迦教派的领袖，既是宗教的象征，也是人性的化身。他既有渊博的学识与澄澈的智慧，也有内心的柔软与温情。面对弟弟的逝去，他流露出深沉的世俗之情；面对侄儿的成长，他展现出慈父般的关怀；面对世人的悲苦，他以悲悯和温情去照拂。他希望通过佛法的教化，带给人们慈悲和宽容的甘露。这种对人性细腻的观察，使得这一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此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各具特色。八思巴的坚毅与果敢、娘卓·韦登的骁勇与悲壮、袞邦确塞的诚挚与深情、白廓宁珠的温婉与哀愁、雯宗列麻的热烈与绝望，以及玛贡吉吉的美丽与温柔，都展现出不同性格的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通过对这些角色命运的书写，小说不仅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深刻展现了个体灵魂在时代巨浪中的艰难跋涉。历史不仅是宏大事件的记录，更是无数个个体情感与命运的幽谷回响。次仁罗布以文学的力量，将历史从冰冷的记录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情感的温度与人性的光辉。

《乌思藏风云》不仅是一部恢弘的历史画卷，更是一部充满文学色彩与个性语言的艺术杰作。次仁罗布以其细腻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巧妙地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生命空间。从散落的村庄到喧嚣的集市，从孤寂寂寥的寺院到炊烟袅袅的民居，从日常的俗世琐事到庄严肃穆的宗教仪轨，素朴的生活流淌展现了普通人的日常图景，同时为历史叙事提供了真实的生活背景。这些浸润着生活质感的细节，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底色，更让历史焕发出人性的温度。

在《乌思藏风云》中，细节描写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和事件的铺陈，更深入到了人物内心世界

的细腻刻画，尤其是在贡噶坚赞的形象塑造上。贡噶坚赞身处历史巨变的漩涡之中，作者通过对他在夜深人静时孤独沉思的描写，与随行僧侣之间简短的对话，以及每次重大决定前的短暂沉默，深刻揭示了他作为领袖所肩负的沉重责任与面对本民族前途时的艰难抉择。这些细节描写不仅让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立体，也让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通过人物的命运与选择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此外，袞邦确塞的心路历程同样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得以充分展现。他从米粮国到萨迦寺的艰难跋涉，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旅程，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在这段旅程中，他的焦虑、恐惧与深刻反思被作者以充满张力的笔触刻画出来。这些细节的叠加，使得人物的情感经历更加饱满，也让历史叙事在个体的挣扎与成长中焕发出动人的光彩。这种将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既展现了历史的厚重，又赋予了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触摸到那些真实而动人的生命脉动。

作为一位具有担当精神的作家，次仁罗布回溯阔远的历史时空，通过描绘西藏在历史洪流中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阔画卷，让那些尘封于岁月长河中的人事鲜活再现，既深刻探讨了民族命运的走向，又关注个体灵魂的归宿，重新唤醒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升华。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